

丁四新
等著

英语世界的 早期中国哲学研究

Frontiers of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Written in English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丁四新 等著

英语世界的 早期中国哲学研究

Frontiers of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Written in English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世界的早期中国哲学研究 / 丁四新等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308-17343-8

I. ①英… II. ①丁… III. ①古代哲学—研究—
中国 IV. ①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6700号

英语世界的早期中国哲学研究

丁四新 等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唐妙琴

文字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蒋红群 张小苹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42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343-8

定 价 6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英语世界的先秦儒学研究	1
第一节 孔子与《论语》研究	1
1. 《论语》新近英译本的问题与郑文君的评论	1
2. 孔子之道:忠恕、仁、德性伦理	6
3. 孔子之道:礼、乐、情感	13
第二节 孟子研究:以人性论为中心	19
1. 孟子的人性论	19
2. 孟子的道德哲学及情感、耻等概念	22
3. 中西观念比较中的孟子思想	28
第三节 荀子研究:道德论、礼论和正名思想	30
1. 荀子的道德论和人性论	30
2. 荀子的礼论与政治社会观	33
3. 荀子的正名思想	35
第四节 与先秦儒学相关联的现代性观念反省	37
1. 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37
2. 儒学与德性伦理、环境伦理	43
3. 儒家伦理的理论特点及儒家与全球化、普遍性的关系	45
参考文献	50
第二章 英语世界的先秦道家研究	60
第一节 《老子》的英译与思想研究	60
1. 《老子》英译本的研究与三种新近译本	60
2. 方法论:《老子》的阅读与解释	67

3. 《老子》思想研究:本体伦理学、谦卑之德	72
第二节 《庄子》文本及其思想研究	74
1. 《庄子》的翻译、文本研究与庄子学派	74
2. 《庄子》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及视角主义	80
3. 《庄子》与神秘主义	85
4. 《庄子》与伦理学	91
5. 《庄子》中的自我及身心关系	94
6. 《庄子》的语言	100
第三节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庄思想研究	106
1. 老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	106
2. 庄子和克尔凯郭尔——一个宗教的角度	115
3. 老子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思想比较	119
4. 庄子与康德的自由观念比较	121
5. 庄子与古希腊的怀疑论者塞克斯都	124
第四节 从现代哲学与观念看老庄思想	126
1. 解构主义、现象学与实在论的角度	126
2. 语言学、西方宗教学、混沌物理学与生态主义的角度	133
参考文献	143

第三章 英语世界的《墨子》研究

第一节 《墨子》之英译、介绍与研究概况	151
1. 《墨子》的英译与“兼爱”等概念的翻译	151
2. 葛瑞汉的《墨子》研究及墨家分派的问题	153
3. 《墨子》互联网介绍与新近学术动态	156
第二节 墨子“十义”研究	158
1. “尚同”与“非命”:天的补偿权利及人的独立自主性	158
2. “兼爱”与“非攻”:“兼”与“别”的观念	161
3. “节制”观念:节用、节葬、非乐	164
4. “天志”与“明鬼”观念	165

第三节 墨子的道德哲学与道德认识论	168
1. 《墨子》的道德哲学:义与利己	168
2. 对墨子道德原则的研究:功利主义者,还是神命论者?	171
3. “三表法”研究:墨家的道德认识论	172
第四节 《墨辩》与《墨语》研究	174
1. 《墨经》的重构与“内涵语境”研究	174
2. “辩”与“类”的观念辨析	176
3. 对《大取》《小取》及《经下》《经说下》第六十七条的分析与诠释	179
4. 《墨语》的伦理学及身体轻重权衡之喻	180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墨家问题	181
参考文献	183
 第四章 近十年英语世界的名家哲学研究	 189
第一节 二十世纪英语世界的名家研究回溯	190
1. 《公孙龙子》的英译	190
2. 成中英、葛瑞汉、陈汉生等学者的《公孙龙子》研究	191
第二节 近十年名家研究状况	195
1. 关于“名家”概念的研究及对《公孙龙子》的理解问题	195
2. 关于《白马论》《指物论》的研究	198
3. 关于名家基本论题的研究	202
4. 从语言学角度对先秦名家的研究	204
第三节 结语	206
参考文献	207
 第五章 英语世界的秦汉哲学研究	 211
第一节 “学派”观念的创设与司马谈、迁父子研究	211
1. 司马谈与“六家”概念的创造	211
2. “家”的概念:门派的建构与传统的创建	214
3.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218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宇宙论与道家思想研究	223
1. 秦汉时期的宇宙论研究	223
2. 黄老道家思想研究	230
第三节 董仲舒的儒家哲学思想与汉代的性别观念	237
1. 董仲舒:历史和哲学重建的尝试	237
2.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研究	242
3. 阴阳理论与性别问题	246
参考文献	248

第六章 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

第一节 《周易》在西方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	253
1. 近十年来的《易经》英译	254
2. 对西方来华传教士《易经》翻译之研究	260
第二节 《周易》经传研究	262
1. 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卦名、卦爻辞、卦爻画、卦爻象的研究	263
2. 《周易》哲学思想及其诠释方法的研究	268
第三节 易学史研究	276
1. 司马富的易学史研究	276
2. 韩子奇的宋代易学史研究	278
3. 伍安祖对朱熹、王船山等的易学研究	280
第四节 出土易学研究	281
第五节 对《易经》的借鉴与比较研究	284
1. 对莱布尼茨二进制与《易经》之关系的研究	285
2. 对荣格心理学与《易经》之关系的研究	287
3. 对约翰·凯奇“机会创作”及《易经》与音乐创作之关系的研究	289
4. 关于康德、怀特海哲学与《易经》的比较研究	291
5. 对《易经》与宗教、天文学的关系之研究	294

第六节 《易经》与当代西方社会	296
第七节 结语	298
参考文献	300
【附录】 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回顾与展望 ...	306
第一节 晚近之研究趋势	308
1. 以经典诠释传统为题的多种新出版的总论与论文集	308
2. 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310
3. 更严谨的研究方法	311
4. 更完整、融贯的历史描述	313
5. 普遍人权与“亚洲价值观”之争论	316
第二节 文献回顾	317
1. 先秦时代	317
2. 秦汉时代	323
3. 魏晋、南北朝	326
4. 唐宋	327
5. 明代	331
6. 清代	333
7. 现代	335
第三节 结语	336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337
后 记	345

第一章 英语世界的先秦儒学研究

【摘要】近年英语世界的先秦儒学研究主要围绕孔子、孟子和荀子等的思想展开,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有较大拓展,这大体表现在:(1)基于不同思想先见和理论进路,出现了多个风格迥异的《论语》新译本;(2)对孔子之道、孟荀的人性论、荀子的礼论与正名思想等展开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3)从现代性的视角,对先秦儒学展开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全球化、普遍性、德性伦理、环境伦理等的研究。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在问题意识上更为多元,视角更为多样,思考细腻,诠释深入。当然,英语世界的先秦儒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对《论语》文本真实性的过度质疑,对新出楚地简帛中的先秦儒学史料的关注和研究不足。

第一节 孔子与《论语》研究

1. 《论语》新近英译本的问题与郑文君的评论

孔子与《论语》的思想及相关问题,一直是英美汉学界思想研究的重心之一。随着儒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对于亚太圈的经济增长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之可能性的日益呈现,远在美国等西方汉学界的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变得更为关切,《论语》众多新英译本的产生就是一件尤为值得关注的事情。就这些《论语》新英译本及其相关问题,郑文君(Alice W. Cheang)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大师的声音:论孔子〈论语〉的阅读、翻译和解

* 本章各节分别由丁四新、夏世华、汪奇超和汤云撰写。丁四新负责统稿,汪奇超负责资料的搜集和参考文献的整理。

释》的论文,^①为我们介绍了西方汉学界有关《论语》的翻译传统及近年西人在如何理解《论语》及孔子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她特别评论了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的《孔子的〈论语〉:一个哲学的翻译》、^②白牧之(E. Bruce Brooks)和白妙子(A. Taeko Brooks)的《原初的〈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③黄继忠(Chichung Huang, 1923—2001)的《孔子的〈论语〉》、^④李克曼(Simon Leys, 1935—2014)的《孔子的〈论语〉》^⑤这四种新近出现的译本。这四个译本都采用了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对《论语》的英译名称 *The Analects*, 但是它们解释孔子思想的风格和进路差别很大。

安乐哲和罗思文相信,译者可以运用一种例如揭开原意——与作者或编者之所言谓者相靠近的意义——的方法去翻译《论语》。然而,西方的读者首先必须警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培训使自身预先去安排、设计非西方文本的那种扭曲。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世界观去审视另一种文化,结果反射回来的是那些我们早已熟悉的东西。因此译者必须努力确定他们在《论语》中认知到的他异性(the otherness)资源。安乐哲和罗思文采用一些由英语词联合起来构成的词汇,来表明这些基本的不同,例如为了强调作为过程而不是品质的特性,他们将“仁”译成“authoritative conduct”,而不是通常的

① Cheang A W.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000, 62(3): 563-581. 陈慧(Shirley Chan)在其著作的“引言”中,对自陈荣捷(Wing-Tsit Chan, 1901—1994)之后英语世界的《论语》研究和翻译有一个简约的回顾和批评。参见 Chan S. *The Confucian Shi, Official Service, and the Confucian Analects*[M].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3-18.

② Ames R T, Rosemont H. (tr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8. 研究《论语》的专家梅约翰(John Makeham),对此书和白牧之夫妇的《论语辨》有书评。

③ Brooks E B, Brooks A T. (trs.).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 of Confucius and His Follower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需要指出的是,这本著作的封面上署有《论语辨》的中文书名。有关书评,访问 <http://www.umass.edu/wsp/publications/books/analects/reviews/index.html> 网页。

④ Huang C C. (t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⑤ Leys S. (t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7. Simon Leys 是笔名,本名为 Pierre Ryckmans,中文名为李克曼,比利时裔汉学家,长期在澳大利亚工作。

“goodness”或“humanity”;由于认为知行没有真正的分线,他们将“知/智”译成“to realize”,而不是通常的“to know/knowledge”或“wise/wisdom”。

对于安乐哲和罗思文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郑文君批评道:

安乐哲和罗思文已做了许多工作让读者警觉文化挪用(误挪)的陷阱,即将自己认为真实的东西设想在他人的文化中是有效的。但是,虽然“goodness”和“benevolence”作为“仁”的对应词是拙劣的,然而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至少它们传达了有意义的某种东西,而“authoritative conduct”却不能。又,“government”虽然附带着以西方法律和司法观念形式的躯壳,不能翻译“政”,但是“sociopolitical order”很难说是一个改善。而且,这可能过分强调了其他文化的他异性……被看作基本上是关心政治和实践哲学问题的《论语》,必然与西方现代读者习惯于认为是哲学著作而具有更多纯粹思辨性质的著作之阅读不同。但是以我们的努力所建筑的道路,尽管歧出多途,然而都趋向相同的目的,甚至于一个纯粹思辨的文本,当对成为人意味着什么做出相似的研究的时候,作为关心之一,一定具有作为改善人类生活之帮助而贡献其研究结果的欲望。^①

詹启华(Lionel Jensen)与《通过孔子而思》的作者安乐哲、郝大维(David Hall)一起考虑同样的问题,^②他提出在《论语》中存在“真的”意义,一旦读者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方面接受了必要的教育,这个“真的”意义完全可以被发现。詹氏主张我们或任何给定的人所知道的儒学,是且仅可能是基于我们的立场创作(invention)的产物,即是说,一系列创造性的挪用的产物。郑文君指出,詹启华的观点颇为极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全都在形成我们的需求和支配我们的欲望的历史、个人条件下劳动,我们在文本中所看和所听到的,仅仅是我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安乐哲和罗思文承认传统的观点,《论语》中的孔子或多或少是历史中的人物,但是作为哲学家,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孔子是谁,而是孔子言论的内容。这可能是他们为

① Cheang A W.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000, 62(3): 570-571.

② Hall D, Ames R T.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7. 新出中译本, [美]郝大维. 通过孔子而思[M]. 何金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什么将孔子翻译成以一种毫无个性迹象之声音来讲话的人物,以便他所说的话可以作为与其具体生命相脱离的洞见(disembodied insights)讲出来。在郑文君看来,这比起基督徒接受福音书的教义,而丝毫不把其中的旨意看作基督所经过的人类生活的具体表达来,并不缺少一份荒唐。

李克曼和白牧之夫妇的译本都有传注(commentaries),这除了有用的文本性注释和解释性注释(notes)之外,还包括代表译者作为私人性的阅读,及基于他们的角度对文本做出反应的思想 and 意见的评论。按照郑文君的说法,白牧之夫妇和李克曼是按照中国传注的传统来做他们的工作。白牧之夫妇甚至采取了传统传注的形式,而李克曼则在书后做了与其翻译同等长度的笺注(notes)。这种方式让我们参与、投入到与《论语》的对话之中,但是文本的不透明性(the opacity of the text)却消失了。在进行语言翻译转换的过程中,那些在原文中浓缩、深奥的文本意义就变得清晰、可理解和单一了。为了表达孔子的言论,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添加一些东西是必要的,但是这导致文本趋向于译者,而不是读者。

李克曼的翻译更注意传达《论语》中信息的个人性,他避免对历史的孔子与《论语》中的那个角色作出分别,相反,他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也是传统主义的文本观点。通过一个虚构的时间的描述,李氏做了安乐哲和罗思文不打算去做的那些事情:创作一个发展的人物,他的声音充满了人类的情感。李氏还在《论语》文本和英语读者的关系之间达成妥协,通过这一方法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使读者可以会遇文本中的孔子。这真正地是一个每个人的孔子。不过,郑文君指出,如果说在这个了不起的翻译尝试中有任何缺点的话,那就是李克曼过分热心于试图确保让人们完全进入《论语》之中。因此他勤勉地将汉语调换成现代英语,例如将“official holding the whip”(执鞭之士)换成“janitor”,将“圣人”(通常译作“sage”)译为“saint”,将“君子不器”之“器”译成“pot”,而通常译成“vessel”或“utensil, implement”。

在多大程度上《论语》中的孔子是真实的?或者说,《论语》中有多少语录实际上代表了真正孔子的言论?作为二十世纪《论语》最为伟大的翻译家之一,亚瑟·威利(Arthur Waley, 1888—1966)曾说过:“我认为,在设想那部书(指《论语》)不包含许多,或许可能根本不包含真实的孔子言论的上面,我们

是正当的。”^①威利的话代表一种中间派的立场,而那种认为大部分言论是真实的,属于真正孔子的,这属于右翼,认为没有任何言论是真实的,或者说出现在《论语》中的孔子纯粹是文本创造的虚构之事,则属于左翼。据此,黄继忠属于左翼分子,因为对于他而言,文本的话语是历史上孔子言论的紧密而正确的代表。郑文君批评道,他的阅读可以看作字面意思的阅读(literalist reading),与对于《圣经》仅作文字上的阅读,遂执而信之的方法类似。在他将在《论语》中被神圣化的智慧看作是永恒与不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以至于在文本中不同部分对孔子的描绘不被解释为代表变动的方面或历时的的发展。

白牧之则代表了另一极端,他的立场是左翼的。他相信除了《里仁》篇中与孔子实际所说的东西相应的言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言论真正属于孔子。在中国,十七世纪的考证派学者崔述就怀疑《论语》的真实性;在西方,在亚瑟·威利怀疑论观点的开启之下,西方汉学家认为道家的材料出现在《论语》后五章之中,因此它们只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形成。他们与白牧之团队一起已发展出一个“累加的理论”(accretion theory),旨在解释整个《论语》手抄稿,包括关于制作时间、作者权的问题在内的历史,也即是《论语》文本如何形成,如何被重构,以显示每个单独的文本段落在原始著作中的顺序。换言之,不仅知道哪些部分真正代表历史上的孔子的言论是可能的,而且知道谁写作了所有其他文本的部分及在何时形成也是可能的。^②白牧之团队认为,所有余下的书篇,以大概每一代人——在一位新儒家学派头领的领导下——编纂一篇书的速度形成。这又导致白牧之团队理论的第二个更加旋绕的部分:次序的重构,由此新的文本段落被创作和被添加入原先存在的材料之中。或者说,《论语》大约经过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通过缓慢的累加过程,在鲁国被他的门徒和子孙以一篇书、一篇书添加的方式形成的。这

① Waley A. (t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8, Reprint, 1989: 25.

② 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在《孔子之道》这篇论文中谈道:“大约200年前,中国学者崔述表达了他的争论:《论语》最后五篇不是真实的。在二十世纪初期,杰出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亚瑟·威利暗示《论语》仅有第三至九篇是真实的。最近,白牧之和白妙子辩论道,《论语》仅有第四篇中的一部分,大概16条言论是真实的。”参见Norden B W. The Dao of Kongzi [J]. Asian Philosophy, 2002, 12(3): 158.

意味着《论语》多达十九篇文章实际上都不是来源于孔子,而在文本中的孔子这个角色仅仅是一个文学上的虚构和一个手段,通过孔子之口将其他人的思想插入其中,给予它们更大的权威。虽然白牧之的假设非常精彩,郑文君评论道,然而并不能被证实。白牧之团队的论证,部分是建立在坚固的证据基础之上,部分则是以推测为基础,或者以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所说的一些话是“内在的合理的”(intrinsically plausible),一些话“在考古上被证明了”(archaeologically attested)。

总之,我们听到了《论语》中孔子的原始声音,但是被译者的翻译覆盖了,结果是一个吸纳了像实际的孔子言论一样多的翻译者自己的个性,即参有他的情感和成见的合成物。李克曼的孔子以平静而彬彬有礼的方式讲话,他首先是一个和事佬;在白牧之夫妇的描述中,孔子经过了漫长的演进,但是保持让“狂怒的正直”(furious integrity)和“大度的愤怒”(generous anger)贯穿在他所有的人生变化之中,而译者颇为明显非常尊敬这些品质。黄继忠的偶像化的孔子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属于圣徒传之类的主题。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作是独特的,因为他们的孔子没有投射任何意味的个性,反而可能反映了这两位学者的哲学观。李克曼和白牧之这两位西方汉学家在他们的成熟期已决定以传注的方式从事《论语》的翻译,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无论这种快乐的合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双倍有幸地拥有李克曼和白牧之团队的著作。李氏对于能够向一般读者讲话的孔子感兴趣,而白牧之的孔子则是一个语言学家罕见的例子。就语言学的基础来说,白牧之夫妇的翻译远胜于在此被评论的任何他人的工作。

2. 孔子之道:忠恕、仁、德性伦理

对于孔子之道,万白安在《孔子之道》一文中,^①对于学术界关于“孔子之道”的解释做出了概括性的回顾和评论,并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学界主要有两条解释路线。一组解释将《论语·里仁》第15章中曾子以“忠”(loyalty)“恕”(reciprocity)代替孔子教义中的“一贯”(one thread)作为理

^① Norden B W. The Dao of Kongzi[J]. Asian Philosophy, 2002, 12(3): 158-171.

解的关键,^①最近有些解释者则强调《论语·子路》第3章中孔子论“正名”(correcting names)的观点。^②在万白安看来,这两种进路因建立在窜入或非代表性文本的基础之上,所以都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论语》显示出孔子是一个强调修养德性,而不是寻求系统概括的思想家。

抛开《论语》文本的真伪性不说,《论语》文本在表面上缺乏关联性,以及不清楚是否有某种组织原则贯穿于其中,这些结构上的明显缺失就让《论语》的读者感到沮丧。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和程颐都曾表达了同样的困惑,^③但是在困惑之后二人同时又都认为《论语》所显示的“孔子之道”是某种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性的东西。然而问题在于,发现“孔子之道”的钥匙是什么呢?西方的学者和翻译家大多数的解释都集中在对《论语·里仁》篇第15章,或者《子路》篇第3章的两段文本上面。在《里仁》篇第15章中,曾子以“忠恕之道”来解释孔子的“一贯之道”,但是,万白安指出,基于一系列的原因,这是令人迷惑和有趣的。孔子只说有“一个”东西,将他的道连接在一起,而曾子在解释孔子的意思时提到了两个东西(“忠”“恕”),而且它们是众人都可以理解的。不仅如此,刘殿爵(D. C. Lau, 1921—2010)将“恕”翻译成“using oneself as a measure to gauge others”,“忠”翻译成“doing one's best”,以此来组成孔子之道。因此刘殿爵将《里仁》篇第15章看作把《论语》作为一个整体理解的中心。但是刘殿爵对“忠”的翻译显然比“loyalty”这个词具有宽广得多的意义。芬格莱特、倪德卫(David S. Nivison, 1923—2014)和艾文贺(P. J. Ivanhoe),亦皆将《里仁》篇第15章看作理解《论语》的关键段落;而且为了达到搞清整个文本之意思的解释目的,他们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对“忠”给予了某种特别的、秘传的意义。这在万白安看来,包括朱熹在

① 参见《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② 参见《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③ 芬格莱特的儒学研究以一册小开本约80页的《孔子:即凡而圣》一书名世,对西方儒学思想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ngarette H.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2. 该书中译本,[美]赫伯特·芬格莱特. 孔子:即凡而圣[M]. 彭国翔,张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内,任何一种像这样的阅读是存在重大问题的。朱熹的解释严重染上了佛学形而上学观念,这对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来说完全是外异的。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任何循顺朱熹之法对《里仁》篇第15章的解释都会面临两个致命的困难。其一,有大量文本上的和有条件可依的证据表明《里仁》篇第15章是伪造添窜的,是在孔子死后乃至《里仁》篇编成后较久才被插入其中的。^①《里仁》篇第15章中曾子的评论似乎是对《卫灵公》篇第3章中“一以贯之”的引用,所叙述的故事在历史上是不可信的。除了《里仁》篇第15章之外,《论语》中没有曾子与孔子对话的其他记录。而且,曾子在《论语·先进》篇第18章中被描述成“鲁”(stupid)。^②孔子为什么会向一个较为年轻而且不是特别聪明的弟子甩出一个明显隐秘的评论,还没有检查以确信他是否明白了,就离开那间房室呢?并且,为什么其他的弟子会冲上前来,向这个年少的弟子询问一个解释呢?而曾子将孔子的“一”道解释成二事,他对于孔子之所言的解释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二,即使《里仁》篇第15章在历史上是真实的,也不能对《论语》的其他文本给出具有洞察力的解释。有两点是很显著的:第一,在《论语》的其他部分中,“忠”不是以朱熹、刘殿爵和其他人在《里仁》篇第15章中认为的那种方式被使用,而是“loyalty”的意思。第二,除了《里仁》篇第15章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忠”“恕”在《论语》中是一对特殊的术语。对于孔子而言,“忠”“恕”确实是两个重要的价值,但是从整体上而言,在《论语》中它们并不比仁、义、智、勇、孝更为重要。

近来,有一些解释者认为《子路》篇第3章的正名观念是理解《论语》的关键,然而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些解释者认为正名具有更为广泛得多的意义。正名论对“名”持有“厚”的理解,它有两个要点:(1)“名”仅被应用到那些实际上做到了相关深厚描述的东西上面;(2)人们做到了应该应用于他们身上的深厚描述。举例来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③在此,孔子以一种对君、臣、父、子具有深厚的观念而在回答问

① Norden B W. Unweaving the “One Thread” of Analects 4:15. in Norden B W. (ed.).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New Essay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9-224.

② 参见《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对于“鲁”的理解,他人与万白安不同。理雅各译作“dull”,亚瑟·威利译作“dull-witted”,刘殿爵译作“slow”,安乐哲和罗思文译作“thick”。这里特别加以指出。

③ 《论语·颜渊》篇第11章。

题。因此孔子是在说,如果您想让社会运行良好,那么君主必须担负起作为君主的责任,臣子必须担负起作为臣子的责任,父亲必须担负起作为父子的责任,儿子必须担负起作为儿子的责任。这是正名意义的一个方面:要求人们践行那些对应用于他们自身之“名”作出深厚描述所意涵的准则(norms)。另一方面,在孟子的革命观中,纣由于没有履行君应当履行的责任,他就不应该被称为君,而被称为独夫,正名意义的第二方面在此被很好地阐明出来:“名”应该仅仅应用于那些事情上面,这些事情至少在一个重大程度上履行了对“名”的深厚描述所体现的那些标准。万白安猜测,将13:3看作是《论语》的密码的观点,很可能源自于冯友兰。冯友兰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第一卷,强调了正名对于孔子的重要性,与柏拉图对于概念的定义活动非常相似。^①冯氏对于几位最近的哲学家对孔子的解释产生了深重影响。他们之中最为著名的可能是陈汉生(Chad Hansen)。陈氏跟随冯氏的观点,将正名当作孔子思想的中心,并认为正名具有指导行为的那种作用。^②对于此种意见,万白安指出,五十多年前亚瑟·威利就表达将《子路》篇第3章看作孔子思想之表达的历史可靠性的怀疑。威利说《子路》篇第3章以一种明显的“链锁论证”(chain argument)的方式写成,可是这种方式在《论语》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子路》篇第3章是伪造的,因为连与孔子经常谈话的子路,在听到其师言及正名之时也感到非常震惊,该篇的作者也可能借此期望读者在读及正名论时感到同样的震惊;中国哲学“语言的危机”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名实的讨论发生在这之后,然而《论语·子路》篇第3章却是一个唯一的例外。^③万白安在威利的基础之上又补充了两点。第一,“名”这个术语在《论语》中仅出现八次,如果认为正名是孔子的中心观念,那么这是令人惊讶的;而且,13:3中的“名”更像晚出的文本,如《论语》第17篇或《荀子·正名》中的同名概念;第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黎辉杰(Loy Hui-

① Fe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 Vol.1. Derk Bodde. (t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59-62.

② Chad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5-71.

③ Waley A. (t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8, Reprint, 1989:21-22.